

国际学生流动、机会与迁移的自愿性：一种新的概念性方法

丽莎·鲁思·布鲁纳、伯恩哈德·斯特雷特维泽、拉吉卡·班达里

丽莎·鲁思·布鲁纳 (Lisa Ruth Brunner)：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移民研究中心博士后

电子邮件：lisa.brunner@ubc.ca

伯恩哈德·斯特雷特维泽 (Bernhard Streitwieser)：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教育与人类发展研究生院副教授、难民教育进步实验室主任

电子邮件：streitwieser@email.gwu.edu

拉吉卡·班达里 (Rajika Bhandari)：美国班达里公司创始人

电子邮件：rajika@rajikabhandari.com

国际流动的学生常常被视为相对同质化的群体，拥有共同的动机和经历。然而，高等教育、流动性与（移民）迁移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这一过时的观点。

随着全球北方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政府也将这些学生视为未来“理想”移民，当前高等教育已经嵌入了一个日益加深的教育与移民的联系之中，或称“教育移民”（*edugration*）纽带中。高等教育机构还为难民保护提供了全球化的途径，这也是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所发布的《全球难民契约》（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日益关注的重点。这些变化以及其他转变为跨学科研究国际学生流动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国际学生流动的“混乱性”

国际学生流动指个人为了获取学术经验而前往他国的物理流动。然而，这一现象长期以来在迁移研究领域未得到足够关注，在国际教育领域也缺乏深入的理论化和批判性

探讨。近年来，这一主题逐渐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重要议题，而相关研究也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和挑战。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结构的演变，界定“谁是国际学生”变得愈发困难。此外，将国际流动性研究优先于国内流动性研究的做法，引发了关于跨越通常具有殖民色彩的国家边界的独特性问题。国际学生流动的动机和经历极为多样化，使得以简单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类几乎不可能。正如汉斯·德·维特对“国际化”这一术语中“问题性模糊”的批评，我们认为国际学生流动也同样面临相互交织的“混乱”问题。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更细致和批判性的视角，同时正视其不同背景下的多维特性。

混乱的术语

术语在组织和传达价值观时具有话语意义。与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术语不仅使用不一致，它们还掩盖了（移民）迁移的复杂性和权力关系。例如，随着“教育移民”（*edugration*）的扩展，区分国际流动的“学生”、“移民”和“难民”变得越来越困难。

联合国难民署（UNHCR）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且可以说过时的“难民”法律定义，也越来越受到批评，认为它服务的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迫迁移民的需求，并排除了一些更广泛的迁移模式，诸如气候危机引发的流离失所。

术语在组织和传递价值观中具有话语意义。与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术语不仅使用不一致，还掩盖了移民中固有的复杂性和权力关系。例如，随着“教育迁移”（edugration）的扩展，越来越难以区分国际流动的“学生”、“移民”和“移居者”。此外，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的定义因其欧洲中心主义且显然过时的法律解释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定义更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而非被迫迁移者的需求，并排除了更广泛的迁徙形式（如因气候危机导致的流离失所）所需的保护。

混乱的数据

国际学生流动相关的数据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的类别可能会被混淆，从而使国际比较和公众讨论变得复杂，而且这些数据通常是不完整的。例如，关于国际学生转为永久居民的统计数据缺乏，阻碍了对“教育移民”模式的理解。与此同时，从事教育的难民往往不被算作国际学生，因此被单独列出并单独理论化。

混乱的实践

高等教育机构在学费评估、奖学金资格和其他行政目的上粗略地区分国际流动学生的类别。具有移民背景的“本国”学生被随意地与国际学生区分开，而那些没有合法身份、无国籍、跨境原住民国家成员或其他无法轻易归类的人，则挑战了“国内/国际”二

元分类。同时，寻求庇护者和刚刚重新安置的难民可能被视为“本国”学生，但他们需要“国际”学生服务，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学生事务和资助模式。

重新定义国际学生流动

我们认为，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的交织所导致的“混乱”部分源于缺乏对其的细致分析方法。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两个关键概念的新理论框架。

第一个概念由施特赖特韦泽（Bernhard Streitwieser）提出，将国际学生流动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第一类是“启蒙流动”（mobility for enlightenment），即自愿的国际教育。第二类是“机会流动”（mobility for opportunity），即由经济迁移驱动的国际教育。第三类是“生存流动”（mobility for survival），即被迫迁移的国际教育。

第二种方法由厄尔达尔（Marta Bivand Erdal）和奥本（Ceri Oeppen）提出，强迫迁移和自愿迁移间具有连续性，而非对立的二元选择。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识别出国际学生流动的两个结构性要素：首先是“流动的自由度”，即流动的自愿性；其次是“流动对机会本身的影响程度”。

流动的自由度

自由度通常被视为迁移中的一个明显区别：难民被迫迁移，而国际学生具有自主性。然而，我们认为国际学生流动中流动的自愿性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连续性概念，包含多种不同程度的自由度。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在国际学生流动的分析中纳入难民、被迫迁移的个体以及其他流离失所的学生，并认识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及

当代力量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以及它们对流动自愿性的影响。

通过流动获得机会

国际学生流动通常被讨论并运用在其为个体带来的经济效益层面。但在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讨论中，常见的观念，如向上流动和布尔迪厄（Bourdieu）的资本理论，往往过于简化。我们建议也应将机会视为一个连续性概念，从而为各种可能的机会程度——无论是教育机会还是其他机会——留下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国际学生流动的相对性，即社会标记不是静态的，而是通过流动不断（再）生产的，“机会”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情境性。

自由度与机会的交界

在重新定义中，国际学生流动的结构由这两个谱系的交界决定：自由度和机会。换句话说，“流动的自由度”与“通过流动获得机会”在重要且多样的方式上交叉，从而形成了国际学生流动可能呈现的更广泛的形式集合。

例如，在横向学分流动中，不同国家之间相似排名的机构进行交换，且这些国家的 GDP 相近，参与国际学生流动通常是相对自愿的，对机会的影响也相对边际。学生的社会或文化资本可能会增加，但他们的国际参

与是自愿的。然而，在“教育移民”中，移民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流动形式，通过进入新劳动市场和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由于国民经济的不均衡，学生的流动自由度受到更多制约，而这种流动对他们的机会影响可能更为显著。最后，在被迫的国际学生流动中，难民学生因必要或逃避迫害而加入流动，流动对其机会的影响可能更为巨大。

通过观察这些广泛的行动自由和机会模式，我们重新定义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个体和情境的差异始终存在，因此，我们强调应将行动自由和机会视为两个交叉的连续谱进行理解。

需要改变的地方

随着国际学生流动的社会功能在全球迁移背景下发生变化，学者和从业者都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用来应对这一日益混乱的术语、数据和实践的概念工具。重新思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数据提供者，如国际教育学院的《开放之门》年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需要重新设计如何汇总数据，这些数据是国际教育和难民研究等不同领域研究人员依赖的。如今，我们不能再将被迫迁移者排除在国际学生流动讨论之外，也不能再假设国际流动总是与向上流动相关联。